

生育價值觀與生育行為的代間傳承

一、研究計畫之背景與目的

日本與東亞四小龍相繼經歷少子化、老化等人口發展趨勢以及應運而生的社會問題，跨入二十一世紀後，東亞地區的超低生育率及其衍生之人口議題不但成為學術會議的討論焦點，也引發公共政策辯論是否需要提供更多家庭經濟支持誘因以鼓勵生育 (Johns et al. 2009)。日本政府自 1990 年起即關注生育率的下降趨勢，1994 年與 1995 年分別提出改善生育、養育環境的天使計畫與新天使計畫，國會也在 2003 年立法制定「少子化社會對策基本法」，而後陸續提出相關社會福利政策 (內閣府 2009)。為了履行競選政見，日本現任首相鳩山由紀夫在 2010 年的政府總預算更首度將社會福利等相關預算大幅提高，重要的政策改革包括提高每月兒童津貼的數額、延長領取津貼的年限、並取消對家庭經濟條件的限制，以及在公立中學就學者得免收學費等新方案最引人注目。這些政策的推動顯示日本新政府將以公共預算舒緩家庭育兒負擔，藉此提升國家生育率的總體目標做為政策規劃的方向。其他東亞國家如新加坡政府也長期推動生育政策，至於香港、南韓與台灣則主要以生育補助與稅式優惠以紓解家庭育兒經濟負擔 (劉一龍、陳寬政、楊靜利 2003)，上述國家雖開始進行生育政策改革，但政策的適用對象仍未全面放寬，加上政策施行時間不長，對於總體層次生育率提升的效果仍有待評估 (Suzuki 2009)。

對於二十世紀的西方工業化社會而言，社會與經濟面向的高速成長具體標示人類的發展成就，但是同期間生育率明顯下降、人口成長趨緩也伴隨出現，因此發展與人口的負向關連似乎成為社會科學領域被接受的實證定律 (Bongaarts & Watkins 1996 ; Bryant 2007 ; Lee 2003)。過去十多年持續下降的生育現象，也引發學者紛紛設定低總生育率的標準。Kohler 等人 (2002) 對歐洲國家進行研究指出，當時期總生育率 (TFR) 降至 1.3 時，特定國家即面臨超低生育率 (lowest-low fertility) 的困境。這些國家若是未能透過家庭或鼓勵生育政策適時提供婚育動機與經濟支持，生育率可能長期維持在低點，並可能落入難以改變的「低生育率陷阱 (low fertility trap)」(Lutz et al. 2006)。根據聯合國人口資料進行比較分析，McDonald (2006) 則提出總生育率至少須維持在 1.5 的政策目標，低於該數據的國家都應積極推動相關人口政策。

不過，就在低生育率、社經發展的動能能否持續仍在東亞國家廣泛討論之際，西方社會近期的研究結果卻一致指出已開發國家的生育率有反轉提升的趨勢 (Goldstein et al. 2009；Myrskylä et al. 2009)。

由於時期總生育率 (TFR) 可及時反映國內外社經情勢、急難事件對於個人與家庭生育決策的影響，因此該測量指標常被運用於描述個別國家的人口變動趨勢並進行長期的跨國比較研究。然而，這些優點也顯示 TFR 潛藏的缺點—未校正的時期效果對生育率可能造成偏誤估計。由於婦女的生育結果受到生育數量 (quantum effect) 與生育步調 (tempo effect) 的總和影響，根據人口轉型理論的推論，已開發工業化國家婦女的生育數量下降並無疑義，但是這些國家的婦女因教育、就業延緩進入婚育歷程造成特定時期低生育率的影響效應則需要被小心檢視。因此，Goldstein 等人(2009)利用 Bongaarts 與 Feeney 針對延後生育步調對總生率提出的修正方法，從新估計歐洲與東亞國家在 1985 至 2005 年間的總生育率，其研究結果顯示自 1990 年代起困擾歐洲國家的超低生育率已經逐漸消逝，唯一的例外為前蘇聯國家—摩達維亞 (Moldova)。在東亞國家部分，儘管日本的生育率開始微幅增加，然而韓國、台灣、香港的數據卻仍未脫離超低生育率的風險。另一個剛發表在 *Nature* 的研究則是再次檢驗發展與人口的負向關係是否持續存在，Myrskylä 等人 (2009) 利用聯合國估算之人類發展指標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 與總生育率進行相關研究，並比較此項關聯性在 1975 與 2005 兩個年度的差異變化。他們的研究結果顯示，發展與人口的負向關係主要存在低度或中度發展的國家，當社會發展程度持續增高，生育率即有回升的趨勢，不過發展與人口 J-Shaped 的連結關係卻未見於東亞國家。

當西方工業化國家逐步脫離低生育率的困境，東亞地區似乎仍困在超低生育率的陷阱中。相關研究多指出東亞社會的父權規範仍然存在勞力市場與家庭內部，國家層次的法令與政策對於私領域的介入也較少，因此性別不平等、工作與家庭責任難以平衡仍然持續影響婦女的婚育決策，導致總生育率仍處於低點 (Myrskylä 2009；Yu 2009)。日本作為率先經歷生育率回升的東亞國家，明年即將大力推動家庭與鼓勵生育政策的改革，公共政策能否扭轉現況值得繼續觀察。至於台灣的生育現況，根據美國人口資料局(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PRB) 在 2009 年中的推估數據，台灣的總生育率位居全球最低水準。雖然學者們也利用人口統計方法調整總生育率，並指出台灣女性的實值完成生育水準仍維持在 1.4 到 1.5 之間 (王德睦、劉一龍 2008)，但是

婚育時間後延或甚至不婚的現象卻是台灣社會的近況(Chen 2009)。因此，欲提升台灣地區的生育水準，除了需要政府立即推動家庭與生育政策等激勵措施，也亟需針對台灣民眾的生育動機與生育行為進行全面性、長期性的研究，以了解抑制婚育本能與意願的緣由。

基於對生育研究的學術興趣與社會關懷，規劃的二年期研究計畫預計利用本人先前參與之研究計劃 [子女價值觀的代間傳承 (NSC94-2412-H-001-027；NSC95-2412-H-001-011)] 於 2005 年至 2007 年期間在台灣地區收集完成之抽樣調查作為分析資料，比較來自同一家庭之三代家人在生育動機、態度與行為的異同，並檢視可觀察生育特性於世代間的傳承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模式，藉以說明可能增強或阻斷世代傳承效果的文化性與結構性影響因素。由於上述資料當中的第二代樣本—母親—的平均年齡在 2009 年底已接近 50 歲，而且都經歷過生育事件，若僅以該樣本做為理解台灣婦女生育行為的主要依據，即可能忽略當前阻礙婚育歷程的影響因素。為彌補上述實證資料的缺漏問題，並探索 1970 年以後出生、近年已陸續進入婚育階段之台灣婦女的生育特性，第一年的研究計畫將再原始抽樣地點面訪 500 位結婚時期不超過五年，目前育有 2-3 歲幼齡子女或尚未生育的婦女樣本，該資料將與前述母親樣本進行生育行為的出生年輪比較研究 (cohort analysis)。結合上述資料進行整合分析與比較之後，本計畫預期說明台灣社會在過去半個世紀間，個人的生育動機與偏好如何在家庭系統中被型塑進而達成世代延續，以及釐清家庭以外的社會制度與結構因素如何介入並影響個人的生育行為，研究結果將能說明台灣地區總生育率的長期變動趨勢，並進一步提出可行的政策建議。

二、生育價值觀 (Value of Children)研究之重要性

前全球多數國家正經歷劇烈的經濟與社會變動，雖然部分工業化社會已面臨生育率快速下降引發之高齡化問題，但許多國家仍苦於過高的生育率與遲滯的社經發展困境。人口議題長期受到眾多學科的關注，早在人口過度膨脹的 1970 年代，一群經濟學者、人口學者與心理學者已組成跨學科研究團隊，針對生育行為、婚育態度、與生育價值觀展開跨國資料收集，並據此進行第一波國際比較研究 (Arnold et al. 1975)。

生育價值觀(VOC)的概念可溯源自 Hoffman 與 Hoffman (1973)的跨國研究，此概念可用以指涉父母為何需要生養小孩與子女在家庭內扮演的功能。由於這個研究率先強調文化規範性因素對於個人生育決策的關鍵影響，以及在跨國比較研究的獨特重要性，至今相關研究仍大量引述參考這項經典研究的概念與設計。在研究結果部分，他們發現除了客觀的經濟因素會影響個人的生育行為之外，規範性因素與心理因素也與生育決策有關。因此，在個體層次上，研究者可視 VOC 為影響個人生育決策重要的中介變項。VOC 的特質不但常隨社會不同而有差異，社會變遷同樣也可能改變 VOC 的本質與內涵，導致在不同世代具有相異的生育價值觀。Hoffman 與 Hoffman 的原始研究設計考量父母才能選擇是否進入親子關係，其強調父母與子女間非對等 (Asymmetry) 的影響關係也成為後續相關研究的參考範型，並可據此驗證父母的生育價值觀是否與生育行為、子女教養態度有關。

VOC 的研究取徑也因此成為 1970 年代第一波跨國合作研究生育行為的概念基礎，藉此檢視文化、社會區位條件、個人生育價值觀與生育行為的連結關係。在當時頗具規模的跨文化研究規劃中，涵蓋遠東地區的台灣、日本、南韓、菲律賓、泰國、印尼與新加坡，並加入土耳其、美國與德國。為了控制機會結構與家庭資源對於個人態度與行為的可能影響，每個參與研究的國家在樣本的篩選都必須考慮城鄉分布以及社會階級的代表性，依此組成各國的代表性樣本，整體調查由夏威夷東西人口研究中心統籌規畫，委託當地學者負責執行調查與資料收集工作，台灣當時參與的學者為台灣大學農業推廣學系的吳聰賢教授 (Wu 1977)。

簡言之，前述 VOC 跨國合作研究計畫的理念乃試圖發展一套得以進行跨文化比較研究的工具，藉此探索生活在不同社會的育齡父母如何進行生育決策；而這種透過相同研究架構與方法進行比較研究的作法，即可利用同一

組解釋因素的變異程度說明不同國家之間的差異，其中又以經濟性因素(例如：機會成本、資源限制)，以及文化規範性因素被視為國家之間差異的關鍵來源。此外，該計畫邀集不同領域學者參與，期望整合主要理論觀點 (Fawcett 1976)，並企圖開展具解釋力的當代生育理論 (Coleman 1990)。除了研究規劃高度整合之外，VOC 研究解釋生育行為同時考慮個體行動者 (individual-actor-based)與結構 (structure-based)的特性，使其得以解釋社會變遷可能造成的個體變化。

雖然 VOC 研究具有前述的優點，然其概念測量與方法仍有需要注意並加以修改之處。例如，由於實際調查的題數限制，對於主要價值觀的內涵測量不夠清楚；而另一項更關鍵的問題在於 VOC 的理論位階未明，過去文獻中時常提及生育價值觀的內涵包括 9 大面向 (Arnold et al., 1975)，然而該內容主要來自先前的調查資料，並非得自理論推演(Nauck & Klaus 2007)，所以使用 1970 年代的調查研究結果代表 VOC 的完整內涵是否恰當？抑或是 VOC 仍有尚未具體呈現的部分？因此，以 Gisela Trommsdorff 和 Bernhard Nauck 為主的德國社會科學家為了再度驗證並修正原始的 VOC 研究，在 1990 年代發起另一波包括東西方六國(韓國、中國大陸、印尼、以色列、土耳其、德國)的 VOC 研究，定名為 Value of Children in Six Cultures。此計畫在執行過程中又陸續加入印度、迦納、英國、波蘭、捷克、奈及利亞、法國、巴基斯坦、南非、肯亞等國。其主要的研究議題，除仍保有原 VOC 研究對於生育動機與生育行為的部分，新計劃更著重在家人關係，特別是跨越代間的互動、支持與移轉影響關係，此計畫的創新設計在於提供驗證生育價值觀的代間傳承及其影響機制的可能性 (Trommsdorff 2001)。

台灣地區為抑制人口快速成長，自 1960 年代起推行的家庭計畫一直被視為全球最成功的範例之一，同時間，台灣為了因應並控制二次大戰後的人口快速膨脹，從 1965 年開始全面推行家庭計畫。根據 1967 年至 1994 年人口學所進行的一系列有關生育力調查(KAP)的結果顯示，台灣生育現象確實出現了一些重大的改變，自 1956 到 1983 不到三十年的光景，台灣人口總生育率從傳統的高出生率 (TFR 為 3.16) 轉變成低出生率(1.04)；人民平均壽命由 1948 年的 48 歲增加為 1988 年的 74 歲 (Hermalin et al. 1994)；粗死亡率則從 1956 年即已下降至 8.02 ‰，順利完成了人口轉型。這個結果被視為台灣家庭計畫節育工作推行的成功。近期 VOC 研究延續既有傳統優勢以及創新內涵的設計，應可對於台灣的人口與家庭研究帶來許多啟發性的研究觀點。台灣雖然在 1970 年代即曾加入 VOC 的調查研究 (Wu 1977)，也完成有關生育價值觀等議題調查，但卻缺乏後續的比較研究。

在這段時間裡，台灣歷經了人口、經濟、社會結構的快速變遷，從事新一波嚴謹的生育價值觀研究實有其必要性。

隨著時代的變遷，許多國家開始面臨了一個人口出生率低於替代水準及伴隨而來的人口老化問題。台灣也不例外。當平均壽命因著醫藥衛生的進步而大幅延長之際，台灣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在1993年達到了149萬，超過了年度總人口的百分之七而從此正式名列人口老化國家之林。面對人口急遽老化的事實，家庭成員間的互動關係也因而改變，最明顯的或許就是祖父母角色的明顯化了(Lauterbach & Klein 2004； Teachman et al. 2000)。歷史上，祖父母與孫輩相處的機會與時間從未如此密切，固然少子化帶來祖孫關係上的正負影響，但不可否認的，人口生育的問題隨著社會變遷的脈動，已經轉變為家庭代間關係了。

此外，因為華人家庭在從父居的傳統規範影響下，三代同堂的家庭結構形式一直佔有台灣所有家庭型式的三分之一(Weinstein et al. 1990；伊慶春、章英華 1996)，從女居的現象即便在中國大陸較為普遍，但亦深受社會規範的拘限。而在台灣的研究發現更指出，早期家庭社會化經驗中，與祖父母有密切互動關係者也呈現大約相似的比例(Yi et al. 2004)。這樣的趨勢，不僅增加祖孫代間互動的頻繁與可能性，也產生家庭價值觀之代間傳承的重要課題。鑑於有關家庭結構與家庭關係模式的改變一向是家庭社會學的典型研究議題，若能就此進行有系統的考察，應可對當前台灣家庭之代間關係，尤其是生育價值觀的可能傳承現象，有所貢獻。

三、計畫完成預期貢獻

具體而言，本計畫的研究內容與目的預期陸續完成下列四項重要的學術意涵：

1. 描繪一般民眾的生育價值觀及其可能的影響因素

在1970年代初，VOC的研究主要動機來自於人口政策的需求，亦即如何控制人口過度增長及所衍生之諸多問題，故著重在生育行為以及影響此行為之生育態度，以利提供有效的人口政策之參考。之後，家計所從1965年開始，為配合當時全面推行的家庭計畫工作，以二至七年的間隔分別進行數次關於家庭與生育力的調查，提出客觀資料供給政府作為人口政策的依據，也豐富了學界對台灣人口的研究。然而該系列的調查有政策導向的目的，以生育期已婚婦女之婚育知識、態度與行為研究為主，有關生養子女之根本價值觀的探討，相對之下，份量較輕。然而伴隨著人口老化和子女數下降的發展，或許導致生育子女之根本價值觀的變遷，因此的確有必要針對當前民眾生育價值觀及其可能之影響因素，由結構性與關係性，個人與家庭、社會層面等不同面向予以考量，以利提供未來解決台灣人口老化和生育行為之思考方向。

2. 研究主軸放在家庭內生育價值觀的代間傳承

過去許多研究指出家庭價值觀—尤其是教養價值觀及實際教養方式真實呈現代間傳承的模式(Menagan 1990; Yi et al. 2004)。以往台灣的研究也指出，偏好男孩的價值觀雖然明顯下降、但從未消失(Thornton & Lin 1994)。這些家庭內有關子女與生育價值觀的複製過程，是否遵循家庭社會化之代間傳承的模式？且家庭經驗與社會規範的影響途徑如何進行？皆是重要的學術議題。故本研究將秉持1990年代的VOC 跨國研究之主軸，檢視上一代的生育價值觀如何傳遞給下一代，以釐清生育價值觀在不同代間之傳承模式。

3. 探索社會階級對生育價值觀之可能影響

台灣1970年代的VOC研究曾有濃厚的階級取向，立意取樣範圍即為都市中產階級、都市勞工階級與鄉村勞工階級，也證實了當時生育觀念與生育行為的階級差異(Wu 1979)。然而後續的相關研究卻鮮少針對此一重要面向進行探討。西方社會學的家庭研究，一向強調不同階級所展現的價值觀念差異。但台灣近年來使用大型資料的相關研究，或許受限於職業分類的侷限，一直未能發現明顯的階級差異，實為憾事。故本研究將立基在七十年代的抽樣精神，擴大樣本範圍，鎖定白領階級與藍領階級家庭以及城鄉別所可能造成的影響，試圖說明社會階級對生

育價值觀以及對代間傳承的可能效果。

4. 為跨國性和1970年代台灣生育價值觀之比較研究奠下基礎

本研究除了考察台灣民眾的生育價值觀從1970年代以來，是否有顯著變遷及其影響因素之外，尚可針對不同世代的生育價值觀作一比較分析。此外，鑑於VOC 研究計劃之跨國性質，台灣的調查研究結果，不僅可以與同是華人社會的中國大陸進行比較，還可以延伸到儒家文化影響下之東亞社會的比較（如日本、韓國），最後則拓展到父權文化下之亞洲國家（印尼）、中亞地區（以色列、土耳其）和西方社會（德國、美國、法國等）之比較。這些潛在的發展清楚顯示此一研究的確有重要學術意義，值得長期的努力與投入。

因此，台灣家庭生育價值觀與生育行為之代間傳承研究，擬考察台灣家庭對生養子女的價值觀，值此生育率大幅下降之際，考察生育行為背後的價值機制，有重要的學術意涵。研究主旨試圖由個人背景、過去家庭經驗、目前家庭特性以及社會影響因素等主要面向，來解釋生育價值觀的差異。研究重點將超越 1970 年代相關研究對個人所持之生育價值觀和生育行為的討論，而延伸至三代之間代間傳承的模式，假定上一代（尤其是母親）的價值觀會隨著不同的家庭和社會脈絡，進而影響下一代的生育價值觀，並強調家庭社會階級與城鄉資源差異所可能導致的不同影響效果。

四、初步研究成果與會議論文發表狀況

1. 「育齡人口之婚育行爲、對鼓勵婚育政策的認知與態度」調查

本計畫在初始規劃時，原本預計利用先前使用的母親問卷、針對目前有幼齡子女的女性進行抽樣並採用面訪方式收集資料，藉此比較不同世代女性對於子女價值觀與婚育態度、行爲的異同。不過，相關調查經費在計畫審查後被刪除，因此無法採用機率抽樣進行面訪完成此一資料。鑑於計畫執行期間台北市、新北市等直轄市以及特定鄉鎮市區陸續提出鼓勵生育的激勵措施，爲了了解一般民眾對於這類人口政策的認知程度以及看法，本計畫決定修改研究方向，選擇採用電訪方式，針對育齡階段的臺灣民眾進行抽樣，以瞭解其之婚育行爲、對鼓勵婚育政策的認知與態度。

2. 國內外研討會、學術會議

計畫執行期間，主持人與共同主持人已陸續將研究成果以會議論文或期刊論文發表在重要學術研討會、年會，並逐步將之改寫並發表於學術期刊。目前已有兩篇論文正式發表，第一篇發表於日本人口學刊，第二篇即將發表於德國人口研究學刊。以下則是過去一年參與過的主要會議與研討會：

- “Value of Children and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University of Konstanz 主辦。2012 年 3 月 29-31 日，Konstanz，Germany。
- “Precarious Family Formation” Launching Seminar and Project Meeting，Väestöliitto 主辦。2012 年 4 月 18-20 日，芬蘭，赫爾辛基。
- “Population Association of America 2012 Annual Meeting”，美國人口學會主辦。2012 年 5 月 3-5 日，美國，舊金山。
- “European Population Conference (EPC) 2012”，歐洲人口學會主辦。2012 年 6 月 13-16 日，瑞典，斯德哥爾摩。
- “The XIII World Congress of Rural Sociology”，國際鄉村社會學會主辦。2012 年 7 月 29 日至 8 月 4 日，葡萄牙，里司本。
- “The 2nd Asian Population Association Conference”，亞洲人口學會主辦。2012 年 8 月 26-29 日，泰國，曼谷。

3. 國科會「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與研究成果發表記者會

爲接受國科會「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邀請，針對本計畫內容的簡述報告，本文發表於 2012 年 9 月出刊之第 13 卷第 4 期。此外，同年 10 月 24 日則於國科會進行研究成果發表記者會。

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

王德睦、劉一龍 (2008) 台灣總生育率再分析—ACF 法的運用。人口學刊 36: 37-65。

劉一龍、陳寬政、楊靜利 (2003) 鼓勵生育與所得稅免稅額調整。台灣社會福利學刊 4: 53-77。

[日文文獻]

內閣府 (2009) 平成 21 年版少子畫社會白書。

[英文文獻]

Arnold, F., Bulatao, R. A., Buripakdi, C., Chung, B., Fawcett, J., Iritani, T., Lee, S. J., & Wu, T. S. (1975). *The Value of Children: A Cross-National Study: Introduction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Honolulu, Hawaii: East-West Population Institute.

Bongaarts, J. & Watkins, S. C. (1996). "Social Interactions and Contemporary Fertility Transition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2(4): 639-682.

Bryant, J. (2007). "Theories of Fertility Decline and the Evidence from Development Indicator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3(1): 101-127.

Chen, Yu-Hua. (2009). "A Cohort Analysis of the Transition to First Marriage among Taiwanese." *Population and Society* 5(1): 25-44.

Coleman, J. S. (1990).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oldstein, J. R., Sobotka, T., & Jasilioniene, A. (2009). "The End of "Lowest-Low" Fertility?"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5(4): 663-699.

Hoffman, L. W., & Hoffman, M. L. (1973). "The Value of Children to Parents." In J. T. Fawcett (ed.),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Population* (pp. 19-76). New York: Basic Books.

Johns, G., Straughan, P. T., and Chan, A. (eds.) (2009). *Ultra-low Fertility in Pacific Asia: Trends, Causes and Policy Issues*.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Kohler, H.-P., Billari, F. C., & Ortega, J. A. (2002). "The Emergence of Lowest-Low Fertility in Europe during the 1990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8(4): 641-680.

- Lee, R. (2003).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Three Centuries of Fundamental Change."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7(4): 167-190.
- Lutz, W., Skirbekk, V. & Testa, M. (2006). "The Low Fertility Trap Hypothesis: Forces that May Lead to Further Postponement and Fewer Births in Europe." *Vienna Yearbook of Population Research* 2006, pp.167-192.
- McDonald, P. (2006). "An Assessment of Policies that Support Having Childre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quity, Efficiency and Efficacy." *Vienna Demographic Yearbook* 2006, pp. 213-234.
- Myrskylä, M., Kohler, H.-P., & Billari, F. C. (2009). "Advances in Development Reverse Fertility Declines." *Nature* 460: 741-743.
- Nauck, B., & Klaus, D. (2007). "The Varying Value of Children: Empirical Results from Eleven Societies in Asia, Africa and Europe." *Current Sociology* 55(4): 487-503.
- Suzuki, T. (2009). "Fertility Decline and Governmental Interventions in Eastern Advanced Countries." *The Japa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7(1): 47-56.
- Thornton, A., & Lin, H.-S. (1994). *Social Change and the Family in Taiwa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Trommsdorff, G. (2001) "Value of Children and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A Cross-Cultural Psychological Study." Working Paper from VOC.
- Wu, T. S. (1977). *The Value of Children: Taiwan*. Honolulu, HI: East-West Center.
- Yi, C.-C., & Wu, C.-I. (2004). Teen Life in Taiwan. In Judith Slater (ed.) *Teen Life Around The World*, Greenwood Press, USA, pp.223-241.
- Yu, W.-H. (2009). *Gendered Trajectories: Women, Work, and Social Change in Japan and Taiwa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